



重新发现上海

1843-1949

王千马◎著

一个名流社区里的百年中国

2.68平方千米，百位近代风云人物；
天平社区，一个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活样本。



重新发现上海
1843-1949 王千马◎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 / 王千马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308-12229-0

I. ①重… II. ①王…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
1843—1949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4056 号

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

王千马 著

策 划	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 婵
文字编辑	杨 茜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25
彩 插	2
字 数	216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229-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上海市徐汇区天平社区党委书记王纪远同志送来王千马先生所著《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书稿，嘱我写一篇序言。

捧起书稿读着，读着，我这个在徐汇区工作多年的天平社区老居民，自愧对天平社区的了解只是零星、大概的。《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一书揭示了天平社区纵向的历史发展，从19世纪中叶起，直至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历史；横向叙述了建筑、街道、绿化、人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活……构成天平社区的一本大百科全书。

本书的字里行间反映出存真求实、全面客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的文风。寥寥几笔，或将一段历史概括其中，或让一段典故跃然纸上，细细读来，仿佛是一幅历史截断面的全息图像，展示在人们的眼前，让人如临其境，刹那间犹如时光倒流，尽情徜徉在历史长河之中。

本书再现了天平社区前身的百年历史。租界的设置是上海的耻辱，又是输入近代文明的渠道，法国殖民者在这里建造高级住宅区，选址上既考虑靠近商业区，

又避免繁华街道的喧哗,与之又有高等级道路相连接;既地处僻静,又交通方便,闹中取静。建筑形式有西班牙式、英国乡村别墅式、法国别墅式、意大利别墅式……名目繁多的花园洋房,都是内庭宽广、设备齐全、装饰豪华、绿化别致。除了花园洋房外,还有高级公寓,内有高标准套房和齐全设备。它们都先后成为外国殖民者、著名历史人物、社会名流的宅邸。

《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一书反映出天平社区接触西方文明早、吸纳快,把握也较全面,不仅有西方的知识与思想,还有制度、法规、行为、习俗、技艺乃至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它们都渗透在居民生活之中,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习惯。天平人具有开放的胸襟和宏伟的气魄,在上海发展史上,以不断汲取外来文化养料,充实、完善自身文明的新颖气质著称,创造出多姿多彩、活力四射的新时代风貌,影响和扩散至整个上海的方方面面。

本书将散落的历史遗迹、人文传统、古今传说等加工提炼融汇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穿越了时空、穿越了时代,打破了距离、连接了古今,把社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地域人文传统联系在一起,对徐汇区乃至上海的文化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书本无言,却不断地绽放出时代的光辉:

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原动力。《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一书反映出近代史上种种求富图强的精神:推翻封建王朝,实现民主共和精神;国家大一统精神;反击外民族入侵,实现民族图存、独立精神;进行革命、人民得解放精神……汇集成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滚滚洪流。

惩恶扬善,净化社会风尚。本书秉笔直书,褒扬无数正面的人物和事件,起到对当今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激励鼓舞和示范作用;而描述反面的事件和人物,也将对人们起到警示和劝诫的作用。这些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将起到彰善抑恶,以裨社会风尚的作用。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书反映出天平社区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风俗习

惯、人民生活等人文因素的积淀情况,为徐汇区和天平社区领导机关深入了解社区,制订新的民生工程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书有关近代史的阶段划分学说,是当前史学界的一种新理论,有益于史学的发展。提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研究是学术进步的动力,智慧随着问题而拓展,学术通过研究而深化,最终得到统一。

天平社区的文化在成长。本书的出版将成为“感知上海”的优秀文化产品之一,具有较强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让读者更好地熟悉天平、了解徐汇、感知上海,成为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一块基石。从此,“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天平文化,将走进社区深处,走进居民心里;同时,将走出天平,走出徐汇,走向上海,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上海徐汇区原区长 张正奎

写于2013年6月16日之夜



绪 论 **中国转型的上海标本**

梧桐！梧桐！ 001

现代转型的被动应对 006

与转型同步的天平 009

现代化“推手” 012

第一章 **逊清遗影**

01 **落寞盛宣怀** 019

洋务荣光 020

落跑的一品大员 023

落寞残生 026

02 **买办起步的金融世家** 031

席正甫汇丰传奇 031

传统商业文明的艰难转型 034

席氏兄弟的金融迷梦 037

第二章 “北伐”上海

- 03 政治幕僚集团崛起 047
黄郛的市政实践 049
蒋介石的幕僚 052
蒋介石的替罪羊 057
- 04 蒋宋孔：最亲密的陌生人 060
蒋宋合流 062
面和心不和的四大家族 066
“爱庐”里的“中国好声音” 072

第三章 商帮纵横

- 05 那个时代的“大王”们 077
江浙出“大王” 078
现代化的第一次飞跃 081
成于战争，亦毁于战争 085
民族工商业短暂的繁荣 089
真正的春天 091
- 06 官农二代，殊途同归 094
向日本去 095
不传消息只传情 096
豪宅里的风云 099
同归新中国 103

第四章 海派风起

- 07 左翼文化“沪漂族” 109
鲁迅的粉丝 109
从文学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学 112
“左联”与鲁迅的合分 119
上官云珠“飞”越人生 125
现代性启蒙需重启 131

- 08 文艺向“西”看 132
弃化工就画工 132
新文化运动的生机 135
中国女性艺术发展第一次浪潮 136
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觉醒 140

- 09 那些薪尽火传的名师 144
新学校、新人才 146
新式教育的缺陷 151
中学里的大师 156
“高寿”因精神满足 161

第五章 抗战暗云

- 10 知谁有负少年头 167
贼船易上难下的日子 168
刺杀者变成被刺杀者 170
没有独立政权,现代国家只是奢望 173
权力的腐蚀 175

蒋政权加速垮台 178

11 白色恐怖下的潜伏 183

机关“家庭化” 184

假戏真做的夫妻 186

永不消逝的电波 191

那个不能忘却的家 195

第六章 建国大业

12 末路“白日梦” 199

失败的马歇尔调停 200

卷入内战风云 204

落幕 211

13 从此上海不屈辱 213

使我不讲话的唯一方法就是杀了我 214

不怕死的四川人 219

中国王朝更迭周期律 224

市长陈毅 226

斯人已逝,功劳长存 230

后记 你终于“上海”了我 232



中国转型的上海标本

梧桐！梧桐！

没有哪个城市的人，对梧桐的感情有上海人这般深厚。它遍植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浓荫对接，叶密成盖，在烈日炽热的夏天，给人们一路绿荫；到了岁寒之际，又早早地摇下一树的落叶，让阳光在枝干之间穿行，温暖着这个城市的冬天。没有其他种树比它更适合做南方城市的行道树了。这也是法国人当初将它从欧洲大陆引进上海的原因。说起来，它们出现在上海的街头，业已百年有余。

它们一开始扎根的，还是乡土中国。在它们的脚下的土地，原先叫芦家湾，叫淡井村，叫顾家宅。这些名字每次读起来，总会使人眼前浮现出一派淳美的田园风光，泥香四溢，鸡犬相闻，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生生死死，时间如凝固了一般，数代都不曾改变。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到来，这一切都被彻底毁掉了。

一纸《南京条约》，使上海成了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它的命运，开始不再由自己主导。英国人从它身上勒索了一大片租界之后，美国人又跟着递上了《望厦条约》。法国人当然也不会错过分蛋糕的好时机，1844年趁着清政府被英、美搞得头昏脑

胀之际，在停泊于广州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逼迫清政府签下了《黄埔条约》。据此，法国不仅轻易取得了英、美已然得到的诸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还得到了一些新的好处。如：法国人于通商口岸租赁房屋或租地建屋，“其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这为法国后来扩大租界埋下了祸根。

正是在这一年，盛宣怀在他的常州老家出生。这个时候的他，肯定还不明白法国人一系列“不友好”的举动对他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转眼到了1849年的4月，法国人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自己在上海的第一块租界。这块租界位于英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占地约986亩。当年的上海县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城厢，在今天的上海南边，其知名的景点有老城隍庙和豫园。在上海县城的北门外，原先有一条护城河（即今天的人民路），从此成了上海县城和法租界的“分界线”。再往北，有条洋泾浜，则是英、法租界的“分界线”。这条洋泾浜东西向，东头连着的便是黄浦江，它将外滩一分为二，一段属英，一段归法。如今，这条洋泾浜在上海的造城运动中早已不知去向，不了解内情的人，根本不知道它的踪迹。

今天的延安东路，便是洋泾浜的后身。

然而，勒索租界成功的法国人，并不甘心只在这个遥远的东方闷声发大财，他们扩张租界的欲望不断膨胀，其扩张行动也就从来没有停息过。

十几年后，《黄埔条约》所留下的后遗症开始显现。他们在上海不停地通过越界筑路的方式，并巧妙利用统治当局的软弱、恐惧和需要，分别于1860年、1900年以及1914年，实现了三次租界大扩张。尤其是1914年，法租界净增的面积为13015亩。在这三次大扩张之中，1860年的扩张主要是向东，虽然收获不小，但这不符合他们在上海的经营战略，他们主要的收获是后两次的扩张，目标是向西，再向西。“法租界当局其时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它要尽力地将自己的版图由东向西大举推进，最终目的是要与徐家汇衔接起来。因为法国天主教早在那里建立了江南

教会中心，这是法国在华开辟的一个重要基地。”^①

今天的淮海中路、淮海西路就是法国人越界筑路的结果。淮海中路在法租界时期叫作宝昌路，后来又叫作霞飞路。“宝昌”的名字很中国，“霞飞”的名字很古典，总能让人联想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但事实上这两个名字都和中国没有关系，它们均取自两位法国大佬的名号。

英国人喜欢拿中国著名城市为自己租界里的道路命名，比如说英租界中为纪念《南京条约》而命名的“南京路”。和英国人不一样的是，法国人喜欢拿自己国家“优秀人才”的人名作为地名，是为纪念，也为炫耀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说起这位宝昌，他是法租界公董局的重要人物，从1881年到1907年曾17次入选公董局董事会，其中还担任了六届的总董。可以说，法租界的市政建设基本上由他操控。而霞飞则是一位法国将军，他曾在欧洲战场上屡建战功。当他荣升为法国东路军总司令之后，法租界公董局里的诸位大佬们立即想起，这位将军早在1885年就来过上海。尽管当时他还只是个年轻的法国工兵士官，到上海也只是游玩，但这并不影响大佬们将他和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决定，从1915年开始，将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这一叫，就是几十年。

霞飞路初筑时，大概是在1900年，一开始均为泥石路面，后来陆续铺设块石。路筑好，总需要行道树作为绿化。于是，1902年，梧桐被法国人选中，成了行道树的主要品种。自此，它们大规模地在上海落地生根。

正是法国人将它们引入上海，所以它们一开始被称作法国梧桐，简称法梧。

事实上，梧桐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有句古语叫作“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庄子见惠子时就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宛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此鹓雏，即凤凰的一种。庄子的意思是，凤凰从南海飞到北海，只有遇到梧桐，它才愿意落下。除了梧桐，送它金山银山也无法让

^① 郑祖安：《近代上海花园洋房区的形成及其历史特色》，《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它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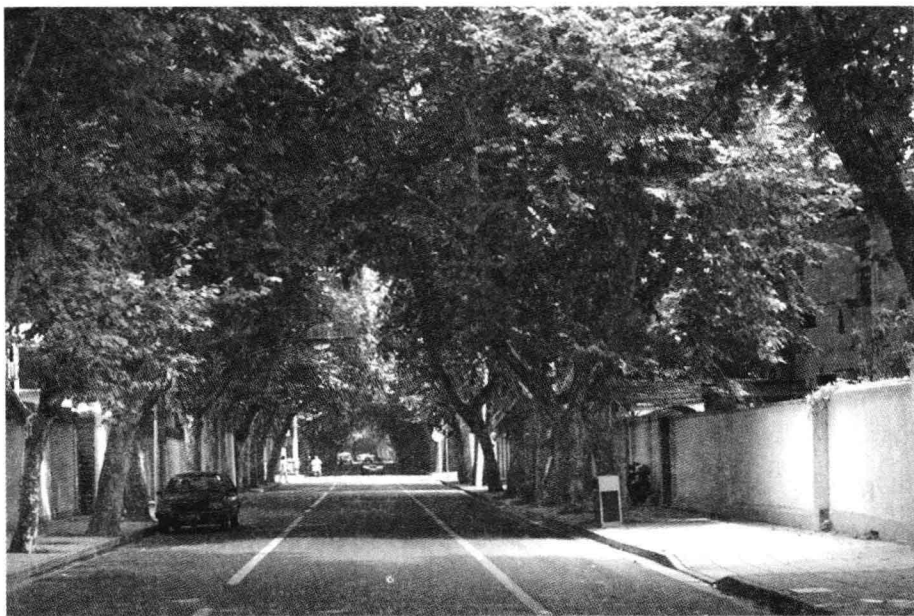
庄子所说的梧桐，高大笔直，碧叶青干，所以才有吸引凤凰的高贵和祥瑞。而且叶、花、根、种子均可入药。而上海这些作为行道树的法国梧桐，树干高大，却不太直；它们的叶子很娇艳，下落时却变成了黄土似的褐黄；它们的果实也无法食用。两者之所以能混淆世人眼球，除了身形近似，也因为它们都长着手掌般的叶片。

如果本着认真的态度追根溯源，法梧只是悬铃木的一种，学名叫“二球悬铃木”。其实它应叫作“英国梧桐”，因为它是英国牛津人拿一球悬铃木与三球悬铃木杂交形成的品种。这种英国梧桐因为是杂交，所以没有原产地，但在欧洲却得到了广泛的培植。

所以这些梧桐被称作法梧还是梧桐，都是名不正言不顺。但在中国，它们强占了梧桐的身份，而且理直气壮，毫不嘴软。与此同时，真正的梧桐却在忍辱求全，为了作区分，退而求其次，改名为“中国梧桐”。中国古诗词中的那些梧桐：“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孟郊《烈女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温庭筠《更漏子》），如今都成了“中国梧桐”。

这不是单纯的将错就错，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弱者从来就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从名字的此消彼长上面，可以看出帝国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力量对比已然失衡。不言而喻，这种此消彼长其实就是一个“告示贴”，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

上海乃至中国已被清晰地纳入了西方时空。



▲上海梧桐街道风情

现代转型的被动应对

说到中国近代的历史，谁也不能忽视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大危机。

从国家竞争上说，这次大危机是这个内部危机日趋严重的封建帝国，败给了有着三百年殖民经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从文明的高度上说，这次大危机则是农业帝国文明败给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学者萧功秦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一个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中华文明“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本身，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①

被纳入西方时空的中国，不能再玩属于自己的那一套游戏，只能遵从对方制定的游戏规则。而为了不被亡国灭种，它只有启动自己的近代化，乃至进一步的现代化大转型。显然，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在外部压力下形成的一种被动应对的大转型。

这就意味着这种大转型是痛苦而又漫长的，就像上海在西方列强的征服下所行经的路线。一个个租界的建立，无疑是屈辱的，是抽在封建帝国脸面上一个接一个的响亮耳光，但这种屈辱却将上海淬炼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而强占梧桐身份的法梧，也在时代的进程中蜕去“原罪”，成为了中西文化交融的代表。

在被列强强占各种租界的屈辱面前，“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批人在用文言文写成的奏折中雄辩地阐述了西方诸国、俄国和崛起的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提出中国亟

^① 陈建利：《从千年文明史看中国大转型》，《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09年11月29日。

须‘自强’并加强本国技术能力。然而中国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和思想保守的平民百姓对他们的建议疑虑重重,不少人把引进外文书籍和西方技术视为对中国国粹和社会秩序的威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占上风的一派得出结论,效仿西方实现近代化无异于彻底西化,而中国没有理由遗弃举世无双的中华遗产。”不过,这种争斗至少也表明,在19世纪中叶,中国士大夫集团里虽然只有极少数人——但好歹还是有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已不再处于至尊地位,中国必须去了解一个由相互竞争的列强集团主导的体系”^①。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大转型有了可能。

1861年开始兴起的洋务运动,成了清朝在被动挨打后的一次自我救赎。

这次自我救赎,是由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发起推动的,主要人物是曾国藩和他的好学生李鸿章,以及张之洞、左宗棠等人。而孜孜以求功名却不得的盛宣怀,也在李鸿章的有意栽培下,被推到了帝国的前台,成了“官督商办”的代言人。科举给不了的荣光,洋务运动给了他。

只是,洋务运动虽然追求强国富民,但盛宣怀推行的“官督商办”的模式,却造成了国进民退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只停留在经济层面,根本没有触碰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它虽然给清朝带来了短暂的兴盛,但很快就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精心打造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洋务运动的缺失。他们认为,光学西方的船坚炮利也不够,还应该在政治制度上有所改变。“当洋务的发展将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发动戊戌维新运动,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②说是变革,其实也是一次博弈、一种妥协。这既需要利益追求者的忍耐,也需要既得利益者的宽容。当两者的需求错位,或者根本就是一方“咬定青山不放松”,改革包

^①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② 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